

区域开发

论世界与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和江苏省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 城市化 江苏 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P9 X

吴良镛¹ 吴唯佳² 武廷海³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¹;教授²;博士研究生³ 北京 100084)

一、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

1. 全球进入城市世纪,城市正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

新世纪有“城市世纪”或“城市时代”之称,未来的世界将被认为是一个城市化的世界。1993年,联合国东京会议称“21世纪将是一个新的城市世纪”。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4亿猛增至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47%升至61%以上。目前,世界上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不只是单纯的居住方式,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2001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纽约“伊斯坦布尔+5”人居特别联大上的致辞指出:“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彻底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不仅在于人们如何生活,而且在于他们生活在哪里。”1976年6月11日《温哥华人类住区宣言》指出:“人类居住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这种条件是全面满足就业、住房、卫生服务、教育和娱乐等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

城市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于其积极的方面,论述颇多,例如:“城市往往是人文与思想的交接面,是文化与革新的巨大源泉”(安南,2001);“城镇是文明的中心,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精神及科学的进步。我们必须利用我们住区所带来的机遇,保护其丰富多彩的形式,以促进全人类的团结。”(《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1996)

城市发展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1)城市可能是贫穷、社会分化、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的渊藪。(2)“随着人口向城市移民,许多社会不公与弊病也随之越来越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有2/3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经济转型国家以堆放的方式处理75%的固体垃圾。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到如下鲜明的对比:贫民窟与高楼大厦肩并肩赫然同现于未经规划、不断扩展的城市;大肆挥霍与垃圾堆积成山同步呈现,威胁着环境和人类健康;住房成本与供应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住房成本同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资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

总之,城市问题以及相关的种种问题是社会、

经济、技术发展的缩影,城市可能是解决世界上某些最复杂、最紧迫的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的关键。

2. 城市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客观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城市世界”

城市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具体反映了全球化的过程。2001年,联合国在纽约召开“Insanbul+5”特别联大,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 Annan)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报告中指出:“世界已进入城市千年,现在人类几乎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城市人口的数量将继续保持快速上升的势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正受到全球化强有力的推动。显然,国际社会正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如何使城市化与全球化为所有的人服务,而不是使数亿人口处在边缘。”

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推动城市化,将使更多的人从这一历史进程中获益,并将缓解当代世界主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使各国共享各类与发展有关的知识,使商品、服务及其他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更好地为全人类提供福利。

世界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势头迅猛,客观上存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化世界”。据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拉美、加勒比海地区、亚洲、非洲的城市人口将翻1番。中国城市化率也将从1999年的30.9%增长到2025年的55%左右,城市人口从1999年的3.89亿增加到2025年的8.3~8.7亿,翻1番以上。中国将成为世界城市化的重要推进器,在21世纪实施的城市化战略的行动,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意义早已超出国界范围。2000年7月,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讲:“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

3. 高密度、网络化、连绵化的特大城市地区愈将凸现,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正日益受到重视

大城市人口激增、发展加速,也是世界城市化的一个特点。2000年,全世界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已有325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20个。预计到2015年,全世界将有358个超百万人

口的大城市和 27 个超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提倡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已成为目前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之一,2002 年世界人居日的主题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城市合作作为一种积极交流“经验教训”、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2002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也纷纷以城市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召开了相关的国际会议。

二、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 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城市化发展迅速。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城市化水平从 18.96% 提高到 36.1%。

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经进入“加速阶段”。过去 5 年,全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约 34 亿平方米(2002 年竣工约为 7 亿平方米),同时约有 5 亿平方米的危旧住房得到改造,近 5 000 万个城镇家庭改善了住房条件,年均住宅竣工面积达到 6.8 亿平方米;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 1997 年的 17.6 平方米,提高到 2002 年的 22 平方米左右,户均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 70 平方米,可满足居民基本居住需要;住宅功能、配套设施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刘志峰报告,2003)

今天的城乡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耗资之巨、涉及面之广、尺度之大等已远非生产力低下时期所能及。所表现出的,已不仅仅是在盖房子,而是在兴建城市,是在塑造未来的社会生活。

2. 战略性地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20%;而人均资源与人均财富则远小于一些资源总量和财富总量并不居前列的国家,因此,总量规模大与人均数量小的严重不平衡,是制定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同时,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适应当今世界的三大潮流:一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二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三要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

面临严峻的现实与世界潮流的挑战,国家“十五”计划纲要中已提出了“城市化战略”,“十六大”也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思路,中国城市化肩负着六大战略任务(中国市长协会报告,2003):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新一轮财富积累的基本动力;是信息时代“五流”(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交汇的网络节点;是培育科技竞争力的创新源头;是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先导中心;是实现可持续目标的操作关键。

3. 已形成城市发展区域模式的多样化

中国幅员广阔、历史久远,不同的地理、文化、经济、社会背景,导致中国地域差异明显(胡兆景等,1997)。就城市化的历史地理分异来说,陈述彭院士结合地域历史文化,将中国城市分为绿洲城镇、港口城市、盆地城市、平原城市等,列有 12 个都市群。因此,必须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的特殊性,探索各自的规律,拟定各种不同模式,因势利导。

4. 沿海特大城市地区已凸现

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大江、大河入海的各三角洲地区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显著增长,共同形成了城市化的地区结构。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城市密集的城市地区,并呈现出城市发展高密度化、网络化、连绵化的特征。(周干峙,2002)

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核心地区之一;区内大中小城市密集,中小城镇发育充分,城镇间多相距仅几公里,堪称“高密度、高城市化地区”。(周干峙,1997)该区以上海为龙头,与全球的互动明显。随着上海城市实力增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也日益凸显,区域经济格局正从“翼形——‘之’字状”演变为“反 K 形——网络状”,“区域城市网络”正在浮现(吴良镛、武廷海,2002),共同构成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城市地区。

京津冀地区,以北京、天津两特大城市为核心,包含京津唐(山)、京津保(定)两个三角形地带。此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在全国处于重要位置,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镇间距较疏离,是典型的各自独立发展的布局结构,如何加强区域内的联系与协调,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规划(吴良镛,2002)提出,要在大北京地区范围内(甚至包含环渤海地带),综合考虑首都经济区的功能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含广州—深圳、广州—珠海两翼,总人口约 3 000 多万,加上香港(约 670 万人)则接近 4 000 万人。1996 年之后,城镇密集连绵发展,已呈连片之势,珠江东岸广深(香港)城市带与西岸广珠(澳门)城市带构造了一个“人”字型的发展态势。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正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城市之间应当积极借助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展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保持经济优势与发展潜力。

这些特大城市地区功能和结构眼下尚很不完善,但已经显现出一些共同特点、趋势:一是皆处于门户位置,二是均具有枢纽功能,三是已呈现密集的网络结构,四是已拥有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五是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因此都可以在一个较大的

范围内合理协调所在地各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以避免大城市内人口和工业等活动过于集中,使有关城市各展其长,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综合体。这一态势对中国城市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其未来发展,必须着眼于尽快缩小与世界发达地区的差距,提高国际竞争力,发挥战略作用。不久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杭州即指出:“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已不仅仅是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世界的长江三角洲。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该用全球化的思维,发展全球化的战略。只有这样,才会有最好的发展战略”。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上述3个城镇密集地区,从城镇密集程度、人地规模和发展速度看,可能都超过了世界上的一些先期发展的高城市化地区,中国沿海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化正日益显现其世界性的魅力。当然,除上述3个密集区外,沿海其他城市地区如闽东南城市群等,也多存在各自特殊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机遇,都应当予以重视和把握。

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实践已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城市地区发展理论,学术研究必须走在前面。

三、江苏城市化道路探讨

1. 江苏地处中国沿海地区,省辖各城市有共性也有个性

(1) 江苏地处沿海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与上海毗邻,经济社会发展受上海影响明显,并呈现很强的互补性。“沪—崇—通”过江通道等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竣工将进一步扩大上海影响的范围,强化上海影响的程度,促进上海与江苏的关系。

规划中的上海市区与崇明县之间的越江隧道,以及连通崇明与江苏海门的崇海大桥,将从根本上改变上海与苏中以及广大苏北地区之间交通联系落后的局面,长江以北地区将受益于上海的极核扩散作用而获得快速发展。上海对苏中(南通、泰州、扬州)及苏北(盐城、淮阴、连云港、宿迁、徐州)的经济辐射模式也将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南通与上海之间的通达性提高后,上海北部长江口地区将形成“北上海”的新格局。

最近的《苏州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吴唯佳等,2002)显示,为了增强苏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苏州应综合考虑与上海、宁波、南通、嘉兴、无锡等城市的关系,并以“西上海”作定位。所谓“北上海”、“西上海”等目前尚只是一种地理空间、经济区域上的概念,但由此可以预见核心城市上海的影响范围将可能扩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程度将可能加强。而周边地区也可据此以各自相

应的条件,探索各自的合理发展模式。(袁瑞良,2002)

要充分发挥江苏区域文化开放产业密集升值的历史优势和特点,进一步完善政策,创造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凸显地方特点的创业环境,通过强化与上海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的投资联系,实现面向全球市场的地区经济一体化。

(2) 江苏的发展,客观上已形成了苏南、苏中、苏北的分异,且区域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要从建立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的高度,积极对待南北差距问题,特别要加快苏中、苏北发展,避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要鼓励苏南与苏中部分发达地区通过区域合作,更多地去参与全球竞争,而限制其在省内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方面,留更多的机会给苏北等欠发达地区。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盟发展的经验,建立“结构基金”。苏中、苏北的发展要讲求实效,在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标准的前提下,着重增强城市经济实力,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做大”、“做美”。

2. 从全区域观念出发,高起点地选择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

要充分发挥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寻求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

(1) 以全区域的眼光,切实把握处理好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的关系。江苏是中国发展的精粹地区,但愈是发达愈要节约用地,严格控制非建设地区。应加强以耕地为主的土地资源保护、以水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余之祥,2002),以及沿江与沿海岸线的综合利用。

(2) 从区域角度考虑大中城市间的相互联系,预留快速交通系统发展的空间,特别注意区域空港、海港、河港的布局及其与快速交通干道的衔接。

(3) 在城镇密集地区,要重视交通网络与其节点上的城镇、村庄的布局结构。这种城、镇、村的聚落往往由一群大小不一、成组成团的建筑群聚集而成,其开放的城镇体系结构带来了规划与发展的灵活性,具有潜在的环境效果。

3. 打破“诸侯规划”的狭隘局限,因地制宜地推进区域协调

过去,人们对“城市地区”理论并不理解,各地习惯于自给自足地解决问题。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局限,本质上是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所谓的“诸侯经济”的反映。尽管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各地区之间并没有设立关税,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本不存在贸易障碍,但事实上由于行政区划的影响,无形中会形成一些贸易的、生产的壁垒,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一种重要的体制上的障碍,结果导致无序发展、重复建设、盲目竞争

等种种问题。因此必须打破狭隘的行政地域观念,倡导新的发展思路,反映在规划上就是要超越行政界限,打破“诸侯规划”,把规划纳入有利的城市地区发展的轨道。实际上,这种状况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引起道萨迪亚斯(C. A. Doxiadis)等规划学者的注意。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规划人员往往还是听命于“长官意志”,甚至“违心地”违背规划原则。今天,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呼吁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当前与未来的关系。规划工作的性质与庄严任务要求规划工作者应该自觉地突破“长官意志”、努力进取。

要打破“诸侯规划”,就必须建立区域协调组织,加强各个地方之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加强各个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尽管市场调节能力在逐步加强,但区域行政协调组织仍然需要发展,这是新时代的新问题^[1]。同时,还需要总结过去(如80年代初)国土规划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政府对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促使区域建设的协调发展。

总之,区域协调工作不能仅依靠行政的力量,更要靠建立在现代社会一系列科学研究、分析、决策与措施基础上的科学行动。最后所达到的区域发

展的协调水平,是评判城市现代化管理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4. 注重发挥地域文化与地方城市特色

城市规划与建设是关系国家和地区发展、人民生活的大事,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优化的结果,江苏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有可能在城市发展上走在前面。历史上,江苏省大多数城市,如南京、苏州、常熟、镇江、扬州等都有非常了不起的特色。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化艰难起步的条件下,张謇努力发展生产力、推进先进文化、全面而有远见地建设近代南通。笔者认为,就其历史先导性来说,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2]。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应该从本地区、本城市的客观条件出发,抓住特殊性,捕捉机遇,发挥创造力,注重发扬优势、特色和地域文化,走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 [1] 吴良镛, 武廷海. 城市地区的空间秩序与协调发展——以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为例. 城市规划, 2002(12)
- [2] 吴良镛. 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及其启示, 待刊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彩图说明

中国的杜鹃

郎楷永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北京 100093)

杜鹃属(*Rhododendron*)是杜鹃花科中最大的家族,约960种,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主产于东亚和东南亚。我国约产542种(不包括种下等级),除新疆和宁夏外,各省区均有,但集中产于西南省区:云南产234种,四川产179种,西藏产171种和贵州产60种。国产542种中,其中420种为我国的特有种,约占国产种总数的77.5%。本属植物的花形多种多样(漏斗状、钟状、管状或高脚蝶状)、别致,色彩艳丽,颇具观赏价值,已成为木本花卉中重要的一族,在园艺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部分国产种类如图所示。(1)藏南杜鹃(*R. principis*) 特产于西藏东南部至南部。(见封面)(2)亮叶杜鹃(*R. vernicosum*)

特产于四川西部至西南部、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见封底图)(3)鲁浪杜鹃(*R. lulangense*) 特产于西藏东南部。(见封底图)(4)大果杜鹃(*R. sinonuttallii*) 特产于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见封底图)(5)陇蜀杜鹃(*R. przewalskii*) 特产于陕西西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东南部至西南部,以及四川西部至西北部。(见封底图)(6)皱皮杜鹃(*R. wiltonii*) 特产于四川西部至西南部。(见封底图)(7)团叶杜鹃(*R. orbiculare*) 特产于四川西部和南部。(见封底图)(8)绒毛杜鹃(*R. pachytrichum*)

特产于陕西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东北部。(见封二图)(9)栎叶杜鹃(*R. paecochrysum*) 特产于四川西部、西南部和西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见封二图)(10)杜鹃(*R. simsii*) 特产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见封二图)(11)长轴杜鹃(*R. longistylum*) 特产于四川西部至中部。(见封二图)(12)千里香杜鹃(*R. thymifolium*) 特产于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至西北部。(见封二图)(13)凹叶杜鹃(*R. davidsonianum*) 特产于四川西南部至西北部。(见封二图)(14)木兰杜鹃(*R. nuttallii*) 产于西藏东部至东南部;印度东北部和不丹也有。(见封三图)(15)钟花杜鹃(*R. campanulatum*) 产于西藏南部;克什米尔地区、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也有。(见封三图)(16)大白杜鹃(*R. decorum*) 产于四川西部至西南部、贵州、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缅甸东北部也有。(见封三图)(17)三花杜鹃(*R. triflorum*) 产于西藏东南部至南部;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东北部和缅甸也有。(见封三图)(18)金黄杜鹃(*R. rupicola* var. *chryseum*) 产于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缅甸东北部也有。(见封三图)(全部彩图均为郎楷永摄) (责任编辑 王宏章)